

贸易天下

邦加岛养虾产业折射中印尼合作新范式

■ 潘玥

在印度尼西亚邦加岛的一个养虾场里,中国企业海大集团提供的全生命周期养虾解决方案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跃升,更为我们重新审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技术进步与共同繁荣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践样本。

从锡矿工人到现代养虾工:个人发展的新路径

Ejak 的故事折射出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深度融合的现实逻辑。两年前,这位邦加岛的普通锡矿工人面临着产业转型的挑战。传统的锡矿开采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也难以当地民众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生计保障。当得知来自中国的养虾项目落户邦加岛时,Ejak 选择了转行,从地下的矿工变成了水面上的养虾工。

在现代化的养虾场里,Ejak 需要掌握的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涉及水质监测、自动化设备操作、数据分析等技术性工作。海大集团的稳定高效自排污系统让他对“技术赋能”有了直观认识:储水、水温、溶氧、排污全自动化,一按拉杆就能换水,每次只需三五分钟。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不仅是劳动效率的提升,更是劳动者技能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从宏观层面看,Ejak 的转型体现了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印尼作为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海洋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缺乏先进的海洋产业开发技术。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当像 Ejak 这样的本地工人通过技术培训获得新技能时,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Ejak 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一周只回家一次,全身心照料虾塘——并非来自外在强制,而是源于对更好生活的主动追求。他在配电箱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下“KU RINDU MU”(我想你了),这种朴素的情感表达背后,是个人奋斗与家庭责任的有机统一。这说明,当发展机遇与个人能力提升相结合时,劳动者能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绿色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实践

传统的发展观念常常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视为对立关系,认为发展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然而,邦加岛养虾产业的实践证明,通过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两者完全可以实

现有机统一。

邦加岛曾是世界重要的锡矿产区,但粗放式的开采模式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这种背景下,海大集团的现代化养虾项目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该项目的核心理念是“与自然共存”。通过建立稳定高效的自循环系统,实现海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污染物的有效控制。整个养殖过程不使用药物,不破坏自然环境,既保证了虾类产品的质量安全,又维护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虾好水也好”,正是这种绿色发展模式的生动写照。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并未牺牲经济效益。相反,由于技术的先进性和管理的精细化,虾的成活率和产量都有了显著提升。Ejak 能够存钱盖房子,正是这种高效益的直接体现。这表明,当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时,不仅不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能够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种绿色发展模式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增长的新路径。中国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邦加岛的实践中得到了生动验证。这种模式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技术赋能与能力建设:超越“内卷”的发展逻辑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时会面临“内卷输出”的质疑,认为中国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对当地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甚至挤压当地企业的生存空间。邦加岛养虾产业的实践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需要明确“内卷”的真正含义。“内卷”本质上是一种资源有限条件下的零和竞争,表现为过度竞争导致的效率损失和创新停滞。然而,在邦加岛的案例中,中国企业带来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扩大了整个产业的发展空间。传统的粗放式养殖模式由于技术落后、风险高、效益低,本身就难以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海大集团的现代化技术方案不是在原有的狭小空间内争夺资源,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其次,这种技术赋能并非单向的技术输出,而是双向的能力建设。中国企业在提供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加注重本地人才的培养和本地企业的

能力提升。Ejak 从传统矿工转变为现代养虾技术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能升级和能力建设的过程。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当地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模式体现了“授人以渔”的发展理念。中国企业不是简单地吧饲料产品卖给当地市场,而是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标准共建等方式,提升当地的产业发展能力。当本地工人掌握了先进技术、本地企业具备了现代化管理能力时,他们完全可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参与市场竞争。

从产业生态的角度看,现代化养虾产业的发展还会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包括饲料供应、设备维护、产品加工、物流运输等各个环节。这种产业集群效应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而不是压缩了发展空间。

共同发展的新范式:从竞争到合作

邦加岛养虾产业的成功实践,揭示了一种超越传统竞争模式的共同发展新范式。这种模式的核心特征是:通过技术共享、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实现参与各方的共同成长。

在技术共享方面,中国企业不是垄断技术优势,而是通过培训、指导、合作等方式,让当地合作伙伴也能掌握先进技术。这种做法看似会削弱自身的竞争优势,但实际上却能够建立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当本地合作伙伴具备了技术能力时,他们不仅是市场的参与者,更是产业发展的推动者。

在利益共享方面,这种合作模式确保了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群体。Ejak 能够通过提成获得更多收入,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真正走出贫困,这种收入分配机制体现了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同时,当地政府通过税收增加、就业改善等,也能够分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在责任共担方面,各方都承担起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责任。中国企业承诺采用环保技术,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当地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保障;当地民众则通过参与产业发展成为环境保护的实践者。

这种共同发展模式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高度契合。从更深层次看,邦加岛养虾产业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任何一国的都离不开国际合作。中国企业在印

尼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不仅有助于印尼经济发展,也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条件。这种合作模式还体现了对不同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尊重。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时,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发展需求,没有简单地复制中国模式,而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探索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径。这种文化包容和模式创新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邦加岛的这个故事让人重新思考发展的本质。Ejak 从矿工转型为现代养虾技术员,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成为印尼海洋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这种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契合,恰恰说明了发展的内在逻辑:当技术进步能够为普通人创造更好的生计机会时,国家的发展目标也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并没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总是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环境恶化,但邦加岛的实践证明,当技术创新与环境友好理念相结合时,发展的边界实际上大大拓宽。技术的意义不在于垄断,而在于赋能。当中国企业选择与当地工人分享技术知识、培养本土人才时,竞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你死我活的存量竞争转向了共同做大蛋糕的增量合作。这种选择反映的是一种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发展观念。

邦加岛的实践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改变:Ejak 存够了钱盖房子,当地的海水变得更清澈,养虾技术在岛上扎了根。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却指向了一条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印尼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邦加岛的成功经验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投资项目,它展现的是两国在新时代如何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当这种模式在更多领域得到复制和推广时,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构建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或许,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让每个参与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正如 Ejak 在配电箱上写下的那句“KU RINDU MU”,朴素而真挚,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人的牵挂,正是推动发展的最原始动力。当发展能够回应这些最基本的人类需求时,它就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共同事业。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兼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

建交三十多年来,中韩两国利益交融,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2024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3280.8亿美元,同比增长5.6%,中国已连续21年位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也在2024年重回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充分彰显中韩双边经济合作的强劲活力。

中国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创新与升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韩国则在美国对华竞争压力下,表现出对华经济“去风险化”的趋势,但却在结构性贸易逆差逐渐累积、整体国际贸易收支恶化的情况下,仍需维护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在此背景下,中韩两国经贸合作仍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推动中韩经贸合作转型,培育高水平合作,共同探寻经济增长新动能,携手构建高度协同的合作新格局已经成为中韩合作的主要趋势。

近年来,中韩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愈发紧密,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相互交织、深度融合的态势。韩国在半导体、汽车制造、人工智能和生物制药等领域具备突出的全球竞争力,其技术研发能力、精密制造工艺以及成熟的产业生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则拥有规模庞大、层次多元的市场需求,以及高度完善的制造体系。这种显著的产业互补性,能够使中韩优化资源配置,不仅对两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大有帮助,也对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与发展起到关键支撑作用。制造业合作已成为中韩经贸合作中的新动能。其中,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合作成为中韩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半导体是韩国的支柱产业。2024年,韩国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43.9%,达141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在中国西安建设的闪存芯片(NAND)工厂是全球单个产能最高的NAND生产基地,约占据三星整体NAND产量的40%,对三星的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自2023年起,三星就一直在推动其西安工厂的主力128层(V6)NAND工艺向236层(V8)NAND工艺过渡。随着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今年2月12日,三星电子宣布,正在计划将其位于西安的工厂升级至286层(V9)NAND工艺,这种深度合作不仅确保了韩国半导体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也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

除此之外,另一韩国半导体龙头企业SK海力士也在不断寻求与中国的合作。SK海力士在中国共有三家工厂,分别为无锡DRAM厂、大连NAND厂和重庆封装厂。早在2019年,SK海力士在无锡的半导体工厂实现重大突破,完全使用中国自产的氟化氢替代了此前依赖的日本产品。今年1月,公司加大对无锡DRAM厂的投入,计划将部分DRAM生产设备升级至第四代10nm工艺,以提升产能和技术水平,无锡的生产和销售公司已成为SK海力士在中国的核心业务支柱。中国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半导体制造业存在明显短板,仍需要同韩国进行合作。

当前,全球汽车行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新能源汽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能。麦肯锡研究显示,2030年全球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将达50%,中国将成为关键推动力量。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823.6万辆,其中,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86.6万辆,占全球销量比重由2023年64.8%提升至70.5%。2025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307.5万辆,同比增长47.1%,继续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与活力。

中韩两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具有深远意义。据韩国研究机构SNE Research最新统计,2025年一季度,全球动力电池装机总量达到221.8GWh,较去年同期增长38.8%。位居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榜首的宁德时代,其动力电池装车量高达84.9GWh,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38.3%,远超其他竞争对手,成为全球唯一市占率超过30%的企业。韩国LG新能源、SK On企业在今年一季度也表现出强劲实力,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

从促进中韩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两国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中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一方面,在低碳发展领域,两国均确立了“碳达峰”“碳中和”愿景,这一战略共识有利于推动双方加速能源转型发展。另一方面,中韩两国在该领域合作存在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中国有着完善的产业链与庞大的内需市场,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增长极,而韩国在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等关键技术领域积累深厚。深化两国合作既可以降低韩国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高依存度,也有助于中韩共同面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加速,携手推动产业技术迭代。2024年12月11日,韩国现代汽车公司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北汽投资签署增资协议,以对应比例共同向北京现代增资约10.95亿美元。现代汽车作为韩国汽车工业的领军者,手握E-GMP纯电平台等前沿技术,此举将助推北京现代的新能源转型,并扩大出口规模。

除此之外,中韩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也拥有广阔前景。当前,东南亚正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2025年6月4日至6日,RCEP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在安徽举办。RCEP成员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上达成基本共识,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初期的整车贸易出海,向深度本地化阶段跃迁。中韩车企可借助RCEP的制度性红利,如关税优惠与原产地累积规则,充分激活产业链协同效应,实现互利共赢。

展望未来,中韩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前景充满潜力与机遇。在全球经济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等全球性议题上,肩负着共同的责任与使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双方可加强科研合作与技术交流,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应把握发展机遇,不断培育中韩经贸高水平合作新动能,以更加开放、包容、创新的姿态,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为稳定两国关系提供更多确定性,为地区 and 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培育中韩经贸高水平合作新动能

■ 田德荣 张心宇

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 符正平 彭曦

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过程中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能够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

在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过程中鼓励首创性探索,要紧紧围绕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来谋划,通过“点”上的突破,以新的理念、新的模式、新的路径、新的技术与手段、新的体制机制等,大幅降低制度性成本,提升经营主体满意度和获得感。为此,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给予一线部门一定改革自主权,并充分保障各类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其能够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具体可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率先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开放部分领域的业务,关注服务贸易“数字化”和服务贸易支付方式、结算方式的新变化。二是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基础上,在数据要素确权登记、评估定价、跨境流通等领域积极探索创新,构建促进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框架;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数字身份认证制度,推动数字经济

和数字贸易规则接轨。三是推进新产业、新领域规则标准制定,积极引导相关企业和行业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加强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建筑业等行业标准制定,争取将国内规则上升为国际通行规则;引入更多国际标准组织,推动标准体系、行业规则双向衔接。

集成式探索包括制度集成、关键改革开放领域集成、机构或平台集成以及全产业链集成等。在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过程中鼓励集成式探索,有利于实现从“单一领域”到“综合效能”的转变,体现了更加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的要求。以全产业链集成为例。全产业链集成主要是从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视角,针对特定领域存在产业规模小、产业集聚度不高、制度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不够、没有形成产业链优势等问题,开展全产业链制度创新。比如,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片区自设立以来,全力建设我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聚焦油气全产业链,创新保税船用燃料油供应、扩大大宗商品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等,提升了油气贸易的效率和便利性,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创新发展。

在实践中鼓励集成式探索,一是

要形成促进制度创新的联合体,该联合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智库等,同时打破各个层级、各个部门、各个主体之间的壁垒和障碍,通过各类制度、政策和资源的整合与联动,形成系统性、全方位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效率提升。二是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创新探索,让改革成果既服务全局又展现地方所长。比如,沿边省份的自由

贸易试验区可重点探索跨境经济合作模式与机制创新。同时,还要与其他开放平台、开放政策进行充分联动。比如,可充分吸收借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中马“两国双园”国际产业合作模式、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在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过程中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离不开制度保障。为此,要加大综合改革授权力度,加强纵向的“综合赋权”,鼓励相关部门形成“合奏”。同时,增强风险意识,在健全制度创新容错机制的同时,健全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和防控机制,重点针对数据跨境、金融开放、边境互贸等高风险领域,建立事前、事中、事后

(来源:人民日报)